

绪 论

中国崛起 · 和平崛起

自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 25 年，是中国从鸦片战争起 150 年长期衰落到达谷底后的反弹，或者说，是中国从明末海禁之后（恰逢西方近代经济文明兴起）500 年长期停滞到达谷底后的回升。这期间，记载着中国人多少屈辱与自豪、尊严与自卑、光荣与梦想！又承受着外界多少误解与揣测、猜忌与污蔑、拔高与赞赏！

从对“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议论的“韬光养晦”中转变，2003 年，中国领导人终于向外界明确提出：中国将和平崛起！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能否崛起才是问题的关键。胡锦涛强调，21 世纪头 20 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他指出：“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而且，要向全世界明确承诺，中国的崛起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不会以损害他国的利益为前提，而将与邻为善，以邻为友，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和平崛起”是中国正在逐渐强大起来才出现的。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承受了各种屈辱，就是因为国力太弱，根本没人来与中国人谈和平，中国人也无处去谈和平；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才有人怀疑中国可否为世界带来和平，而中国人才有可能真正主张和主导和平。因此，崛起是中国寻求和平的基础，和平是中国崛起得到世人拥护的前提。

一 “和平崛起论”提出的背景

“和平崛起论”的提出，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致力于国内建设的和平形象，是要促使国际主流舆论开始意

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史上少有的和平的崛起。

2003 年秋冬时节，有两件事与“和平崛起论”的提出有关，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一是高层智囊学者的研究。

综观世界历史，几乎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与战争相关。16、17 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18、19 世纪的英国、法国，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都曾对外实行殖民掠夺和炮舰政策。20 世纪初德国的兴起打破了旧的势力格局，从而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美、苏两大霸权的兴起更直接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而两者之间又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因此，在西方，许多人也对中国的崛起怀着同样的担心和忧虑，以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生态、粮食、能源等多个层面。归结起来，就是认为，崛起的中国可能成为潜在的霸权竞争者。

能否以史为鉴？在温家宝访美正式以官方身份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和平崛起”前，2003 年 11 月 24 日，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和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应邀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解《15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关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美国等 9 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从整个讲课中，政治局委员们到底得到什么启发，人们不得而知，从主讲教授事后透露的情况来看，应与“和平崛起论”的提出有关。

钱乘旦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访问时，谈及这 9 个国家强弱兴衰的背后原因时称：“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史上应该学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跟进时代潮流。如果跟不上了，就一定会掉下去。”实际上，要跟上时代潮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就是一种崛起，一种复兴。至于一些具体的启示则如：“我们非常强调制度的创新。从制度创新来说，重商主义、工业革命是一种经济革命，也是制度上的。前苏联搞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制度创新。政治方面也是这样。民族国家提倡中央集

权就是制度创新。英国和法国也都是有制度创新的，当然做法不同。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这也显示了一种对其他文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

在学习结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

其实，在温家宝公开谈论“和平崛起”之前，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涉及这个话题。其中之一是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指到这个世纪的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此外，宽泛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崛起，孙中山推翻封建王朝，建立现代国家也是崛起。现在说的崛起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带领中国开创的，一个向着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来前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这个专指的崛起，现在是在崛起当中。^①

郑必坚认为，改革开放 25 年来，总的来说，我们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说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在这个进程当中，中国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教训：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就带来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剧烈动荡，以至于引发大战。其中的原因就是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依靠对外扩张，特别是依靠战争手段来争夺霸权，这条路走下来，结果总是失败。害人终害己。

就中国人自己来说从来没走过这种道路，中国今后当然不会走。所以中国的选择就是和平的崛起，奋力崛起，但是和平的崛

^① 郑必坚：《再释“和平崛起”》，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3 年 12 月 24 日

起。和平的崛起要依靠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又要用自己的发展，来巩固和加强和平。这就叫做和平的崛起。

郑必坚在 2003 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讨论了三个问题：（1）怎样看中国的发展问题；（2）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3）怎样看中国崛起同亚洲的关系。三个问题一环扣一环，对了解“和平崛起论”的提出是一个很好的注脚。^①

首先，中国仍然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什么叫“大规模难题”呢？郑必坚说，这里有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一道乘法，一道除法。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 13 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 13 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包括问题的方面和动力的方面，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这个庞大的人口。而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切努力，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工作，也无论内政、外交、国防，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 13 亿人民过上好日子，并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符合人性，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尔后当然还要继续提高。单单这件事，就够我们两三代中国人忙的了，也就是说，中国哪有功夫去威胁别人呀！

其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 25 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关于这条道路，郑必坚总结为三大特点：一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

^①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学习时报》2003 年 12 月 22 日。

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大判断；到了 90 年代，中国领导人又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二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像中国这样的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国际社会，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三是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毫不动摇地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过去 25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过多次考验。但是，中国人对这条和平崛起新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再次，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紧接着从 70 年代末叶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增长，社会全面进步。此后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促、互利、互助、互补的新型合作关系。

郑必坚最后总结道，作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根据历史和现状的发展大局，提出这样一个判断：总体而言，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说 21 世纪前期，亚洲正面临着世界历史上一个极为难

得的和平崛起的重大机遇。而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则是亚洲和平崛起的一部分。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得益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发展，而且意味着中国作为亚洲一员，将会对亚洲其他国家首先是周边国家的发展、繁荣和稳定，发挥越来越积极有益的作用。

二 大国崛起之路的争议

和平崛起并非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和平之中也有竞争，但要防止竞争演化、转变为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和平的旋律中，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理性的判断。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学派虽然犬儒了点，但却可给容易发热的头脑以警醒。

第一，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政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如《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是以一种“太悲观、太冷酷”的视角来观察国际事务的，人们称他为“黑暗王子”。他所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竞争是零和博弈，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也即是成为霸权者。^①

在他看来，中国思想家中，“孔子对政治太乐观，太理想，孙子比较现实”。出于其现实主义观点，他认为，崛起的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在所难免。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残酷的“丛林竞争”，国际关系是一个凶恶、无情的行当。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危险之中，为自身的安全惶惶不安，因为在国家之上，并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机制可以保障它们的生存。因此每个国家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保证生存，就要尽可能的强大，取得该地区的主导权，那么竞争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名叫做《大国政治

^①米尔斯海默：《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未必发生冲突》（《东方早报》对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专访），《东方早报》2004年1月19日。

的悲剧》的原因。

米尔斯海默认为，有一些组成形式反而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冷战时期的两级结构其实更加稳定，核威慑、核均势其实也可能是一股实现和平的力量。但是国际关系在本质上还是凶恶无情的。

第二，要成为大国就免不了竞争。米尔斯海默对“大国”下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一个“大国”应该有两个核心的组成要素：人口和财富。也就是说，人多，钱多。因此说中国在现阶段是一个较弱的大国，从人口来说，中国可称超级大国，但是还不够富裕。根据他的看法，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崛起的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在所难免。他解释说，用“竞争”，而不是“冲突”，是因为冲突似乎意味着战争。

对于亚洲的另外两个大国，一个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一个是全球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米尔斯海默认为，它们都有成为大国的潜质。日本的经济无疑是发达的，也具备了 1.27 亿人口。但日本的未来是黯淡的，因为日本的人口在萎缩，日本的出生率已经很低。印度的人口已经有 10 亿，如果在经济上能够像中国在过去 20 年中那样发展，那么印度或许可以成为另一个大国。

对于中国提出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外政策也越趋亲善，提倡共同繁荣，是否还认为崛起就一定意味着威胁？米尔斯海默的说法可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目前中国的说法和做法。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还需要发展经济，当然需要友好的环境，也会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但问题是，有朝一日中国真正强大崛起之后，中国还会这样说，这样做吗？这和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完全没有关系。”而本书正是试图从这些方面来论证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三，中美之争的性质与前景。对于中美之间有无可能发生战争，米尔斯海默认为，战争在目前可能性不大。毕竟中国的本质利益是要加快发展经济。而对美国来说，陷入伊拉克问题已经分身乏术，所以在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还会加强。

毋庸讳言，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美国。

例如，目前来看，台湾是中国崛起道路中最具爆炸性的因素，而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中美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一大“麻烦”。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相当重要。而布什政府的政策与克林顿时期是有很大不同的。许多研究者认为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是克林顿时期。米尔斯海默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思想库有许多人属于“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对中国进行“接触（engagement）”。这个接触政策有三个分支：一是经济上，希望让中国走上市场化经济，那么中国在尝到繁荣的甜头之后，就不会“杀会下金蛋的鹅”。二是政治上，希望中国民主化，理想主义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进行安全竞争。三是国际关系上，让中国完全进入国际体系，国际机制的约束力可以实现和平。因此克林顿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希望这三个因素可以导向安全。

布什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打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号。当选之后的前 8 个月内，也就是 9·11 之前，他对中国的政策是遏制，而不是接触。但 9·11 后，中美关系有了可观的改善。

经济全球化和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可否成为和平的保障？米尔斯海默认为，经济的密切合作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安全，密切的经济合作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经济情况好时，可能促进和平，但如果一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比如大萧条，这时联系越紧密，问题越严重。1998 年，日本与美国因为汽车产业的问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当时的关系就疏远了。又如近期，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频繁施压，也是因为美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都陷入了危机。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近期才有的新情况。1914 年一战爆发前，欧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低，但战争还是爆发了。因此，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是主导经济的。

三 中国崛起的目标

“中国崛起”（Rise of China）最早是西方人对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变化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后来在中国的专家学者中，被界定为一种类似国家目标的东西，如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和黄仁伟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等著作所论述的那样，实际上可与许多概念等同和通用，如‘发展’‘复兴’‘现代化进程’‘腾飞’‘振兴’等等。严格地说，‘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没有明确和特殊的定义。

其实，中国崛起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理解中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是一种新的自我形象，表明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压迫的伟大文明古国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重新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而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将重新界定或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为在近 200 年来，世界还没有同这样一个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的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中国人却更多地在考虑中国是否能或多久能崛起，因此，把重心放在制定各种各样的小康和现代化的时间表上。

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类重要文件中，从来不使用“中国崛起”这样的说法，而普遍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等等，如中共十六大所说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①。

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崛起在一般意义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其包含的潜在意义是不一样的。“崛起”可以理解为从一个不那么富强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复兴”还有恢复昔日辉煌的成分；“崛起”更多地关注中国从贫弱的境地上升，而“复兴”则强调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是世界强国现在要重新振兴，反之，如果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就意味着有可能回到“陷入国家分裂、外患再兴、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中”。

^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 2 页，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毫无疑问，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但并非总是一个强国。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是一个大国从弱重新变强的进程。

总之，不论是从语义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推断，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很多中国人思考未来的参照系。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成功”则包括恢复历史曾经有过的辉煌，“失败”则意味着重蹈中国近代历史灾难的覆辙。

如果说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被作为一个纵向的参照系，那么美国就是一个横向的参照系。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志士仁人经常将美国作为学习和赶超的目标。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刻，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后来在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中，提出要“超英赶美”，甚至曾相信，10 年时间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孙中山也如此认为：“美国需百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准此以推，中国欲达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足矣。”^①由此可见，历史与美国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这是中国人百年来的不变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以替代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中，时间表是具体的：再经过 20 年的奋斗，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到本世纪的中叶，使中国达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方面，这为中国人提供了现实的动力，而不是遥远的梦想；另一方面，这些目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中国面临的形势的严峻程度，所谓中国崛起还需要付出多大努力。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而，中国崛起更多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现实，甚至在短时期里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① 《中国哲学名著》第 495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四 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视角和分歧

显然，中国人的目标带有相当浓厚的内向、内省的特点，即主要是以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要的关注点和思考的归宿。这对中国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这客观上的确构成了与国际上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视角。毕竟，国际社会必然更关心的是中国崛起可能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而中国人正在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克服各种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从而实现成为伟大国家的“百年梦想”。

所谓“难以设想的困难”，包括国际环境可能带来的困难。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中国在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如何理解和处理与当今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历史看，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受害者心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变化的基础上，融入世界、与国际体系接轨逐步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思考。

另一部分是思考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问题。对相关的国际环境的探讨也分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对国际环境的利弊分析。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崛起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或者说是标准，即需要拥有维护国家领土和战略利益的各种威慑和反威慑手段。

中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不过是在追求同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裕生活和受人尊重的地位而已。他们考虑的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特别是它可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那些不利的因素，以及中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和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够克服那些困难，消除那些不利因素。这种“内向的思维逻辑”使他们从来不怀疑、甚至根本不曾考虑过，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在别人看来，有可能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一大群富裕文明的人民，对国际社会最起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这当然也是不争的事实。

反观国际上讨论和思考的逻辑，显然视角完全不同。对中国崛起的分析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国际秩序和有关国家的国家利益之影响出发的。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讨论中所提出的命题，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崛起是对当今世界的冲击，不论是“威胁”“问题”，还是“机会”“促进”，等等。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一度十分盛行的原因。

这种区别的确造成了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某种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某种过于严峻的估计。反之亦然，国际社会也有可能对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新建构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生发疑虑，对中国为实现“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采取的防范措施缺乏理解，从而做出根本不对头的解读和反应。

毋庸置疑，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其中有合理的恐惧，有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但也确实存在视中国为敌人的政治力量，它们根本就不希望中华民族拥有富裕的生活和合理的国际地位。

中国一些学者对国际上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和一些重要的观点作过比较详尽的研究和评介，而且明显地在向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版于 1998 年，是全面系统地介绍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2002 年 9 月出版的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一书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该书在同样全面地介绍和评论了国际社会关于

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和议论后，特别指出：“研究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不能离开对于各种反面、制约、阻遏力量的研究，也不能不参考各种对中国崛起失败的预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面力量比我们自己更重视、更敏锐地发现可能导致中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作我们的老师。”^①

五 中国崛起的障碍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仁伟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②。在他看来，中国崛起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首先是如何面对全球化。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又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 20 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①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第 24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

② 黄仁伟：《中国和平崛起与软力量建设》，《文汇报》2003 年 12 月 25 日。

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在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中，可以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

其次是如何解决国内发展的问题。不可否认，我们在 20 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对这些问题，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回答为什么中国在如此众多的复杂问题和历史包袱之下，还能够维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阶段中国崛起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解决崛起过程中存在和发生不公平、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的战略概念和举措。

中国崛起必然对世界带来巨大影响：（1）世界人口 1/5 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世界进步和繁荣的一部分。（2）中国的高速增长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都是重要的动力。（3）中国参与世界分工体系必将促进全球市场要素的优化配置。（4）中国在国际体制中发挥更大的、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可以成为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连接纽带。（5）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6）目前是国际资本流入大于中国资本流出，但是中国资本流出的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7）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

制度建设和财富分配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两大内部难题。首先，今后 20 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

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其次，强国和世界 500 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最后是如何重塑中国的世界形象。中国崛起需要软力量的建构。软力量是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所谓“软力量”，约瑟夫·奈认为，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拖累中国的崛起过程。而在软力量中，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同样重要。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要起的作用包括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改善和推进中国与各国关系的能力。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如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仁政”、“王道”等，道家哲学中的“无为而治”、“平和”等都可以国际关系中起润滑剂的作用。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中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当前应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

本书试图从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特征和当今中国的现行政策方面来阐述和平崛起是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选择。中国的崛起首先是一个大国的复兴，而和平崛起是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是最好的注解。

第一章

哈佛宣言：和平崛起